

古典现实主义与冷战时期国际法及国际组织的实践^{*}

刘志云^{*}

内容摘要 随着法西斯主义横行以及二战的爆发,极力推崇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的理想主义学派迅速衰落,而崇尚权力与均势的古典现实主义学派得以崛起,并占据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导地位。在古典现实主义的强势下,不仅同一时期的国际法学经受了极大的冲击,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实践也受到消极影响。或者说,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成为我们理解冷战时期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实践的一个重要途径。

关键词 国际法学 国际关系理论 古典现实主义 冷战时期

一、导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维也纳会议以来依靠大国均势政策而得以维持的欧洲百年和平局面打得粉碎,为防止灾难重演,维持国际和平,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把目光转向当时已成为哲学世界主导思潮的乌托邦主义(或称理想主义),并逐步发展成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派——理想主义学派(idealism)。^[1]

具体的讲,理想主义者主张恢复国际规范,建立国际性机构与组织,健全对各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制;谴责追求强权政治以谋求自身利益的国家行为,坚持国家应依据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原则办事;主张加强国际合作,巩固一战后稳定的国际社会,相信国际法与国际公约以及公众舆论可以确保世界和平。^[2]而且,理想主义者不仅仅著书立说,在理论上对他们的思想与观点进行深化与传播,他们往往还身体力行,力争使他们的学说在国际社会的实践中得到应用。例如,该学派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3]在1918年1月8日向美国国会的演说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作为战后世界的“和平纲领”。其中,《十四点》强调了为了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必须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4]为了推行《十四点》的实施,威尔逊身体力行,在一战结束后前往巴黎参加和会,竭力游说欧洲国家领导人接受这些原则。他把设立国际联盟视为此次和会及缔结和约的整个程序的关键部分,在他看来,建立国际联盟是以后维持世界永久和平的最主要工具,认为这是达到永久和平之基础。在威尔逊的建议下,1919年1月25日巴黎和会的全体会议通过了建立国际联盟的决议。^[5]这样,凭借一战后世界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以及理论本身的道德号召力,结合理想主义代表人物的身体力行,理想主义学说占据了一战后至二战爆发前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导地位,这个时期国际法与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关系理论与当代国际法的实践”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7CFX044。

* 刘志云,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1] 参见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页。同上,第30页。

[2] 同上,第31页; See also Kimberly Hutching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Rethinking Ethics in a Global Er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9, pp. 7-10.

[3] 出于威尔逊总统对理想主义学派的贡献,理想主义亦称为“威尔逊主义”。

[4] Woodrow Wilson, *The Fourteen Points*, in *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ed by Phil Williams, Donald M. Goldstein and Jay M. Shafritz, Wadsworth,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1999, pp. 23-25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原版影印本)。

[5] 参见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国际组织的建构及运转几乎是遵循其所提出的理念与原则而进行。

但是,自近代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国家之间始终遵循着权力与利益至上的法则,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理念注定要破产。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德国的极权政治与法西斯主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宣告了国际关系学界的“理想主义”理论的破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实主义”理论(Realism)^[6]于20世纪30年代初步形成,并在40年代得到迅猛发展,随即占据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实践的主流地位。^[7]与理想主义者崇尚法律与道德的作用不同的是,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权力是一切政治的基础,追求权力是每个国家参与国际关系的目的。“他们并不满足于将权力看成是无政府的世界中实现其目的的一种工具,而是将权力本身视为一种目的。”^[8]而且,“国际政治的现实是一个持久的斗争进程。所有的国家都是在一个检验权力平衡的、并且将决定出谁是最强大的进程中努力奋斗,‘胜利者’的道德标准将成为整个体系的最终标准。从这个角度看,道德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而不是斗争的合法性基础”。^[9]简言之,在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没有实力的国际关系是空想的国际关系,靠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来实现的国际和平只是一种空想的乌托邦。古典现实主义的这种与理想主义针锋相对的立场与观点,构成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学术论战,即“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论战。

从立论基点和研究结论来看,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分歧具体表现为:^[10]第一,对人性的看法不同。理想主义认为人性本善,至少可以通过修养达到善;现实主义认为人性本恶,人有权欲,本性难改。第二,对国家关系的看法不同。理想主义主张在“道义”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公正的”国际关系;而现实主义则强调世界的竞争性,各国利益不可调和,国际关系只能以“权力”和“利益”为轴心,理想主义的道义和“民主”说教在现实世界里是行不通的。第三,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作用的看法不同。理想主义强调了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重要性,视之为维护国际关系秩序的唯一有效的工具,认为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秩序代表了全人类的真正利益;现实主义认为,法律同政治相比并不更“道德”些,离开权力均势,国际组织体系也常常名存实亡。第四,对社会和世界的看法不同。理想主义强调研究社会和世界“应该如何”;对客观世界抱盲目乐观态度,信奉实证原则,强调人类应当面对争斗的现实,不可陷入和谐的空想。第五,对未来的看法不同。理想主义崇尚“利他主义”,认为未来的目标是实现普遍裁军和建立民主的世界政府;现实主义则认为“利他主义”是一种空想,历史的悲剧正是来自人的权欲和野心,未来的目标无论如何美好,由于受到这种利己主义的局限,只能部分地得到实现。

迄今,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上已经发生四次以上的学术论战。但是,有关理想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的第一次论战,无论是重要性,还是影响力,都是以后的几次论战所无法比拟的。实际上,今天的许多国际关系理论都来源于第一次论战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第一次论战的发展和延续。因此,第一次论战就成了研究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起点,^[11]也成了研究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发展的起点与重要部分。同时,由于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强势以及在二战后得到实务界的重视,其对国际法作用与独立性的贬低或否认立场,不仅严重影响到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在二战后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地位,而且导

[6]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提出后,为示区别,国际关系理论界也习惯将之前的“现实主义”(即“摩根索现实主义”)称为“古典现实主义”;同时也将“结构现实主义”称之为“新现实主义”。

[7] 参见罗伯特·O·基欧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载于〔美〕罗伯特·O·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8] 罗伯特·O·基欧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载于〔美〕罗伯特·O·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9] Vincent Ferraro, *Ideal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Talk to the Antioch New England Graduate School*, Keene, New Hampshire, 3 March 2003.

[10] 参见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11] 参见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致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法研究的普遍忽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同一时期国际法学者本身。^[12]而古典现实主义学者的理论主张,也成为我们分析冷战时期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实践的一条重要的途径。

二、古典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国际法及其对国际事务处理的方式选择

显然,在了解古典现实主义思想所给冷战时期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实践或运作所产生的影响,或者其能够提供的解释之前,探讨古典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国际法及其对国际事务处理的方式选择是为前提性工作。

(一) 古典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国际法

与国际法虚无主义者的观点不同的是,古典现实主义者基本上是承认国际法的存在。实际上,在早期的古典现实主义者的视野中,他们甚至承认国际法能够在国际关系的权力斗争中对国家行为起到一定的规制及约束作用。

不过,与奥斯汀(Austin)否定国际法存在的原因一样,由于国际法缺乏诸如国内法般的一些法律特征,尤其是缺乏立法、执法以及司法机构等要素,导致古典现实主义者对国际法的作用一直保持着怀疑态度。^[13]当然,这种怀疑并没有让他们最后得出否定国际法的判断。事实上,他们趋于把国际法看成是一种存在着重大缺陷的、原始类型的法律。例如,在《20年危机》一书中,卡尔对国际法的性质作出如下分析,即“国际法不同于当代国家的国内法,因为国际法是未完全形成、非充分一体化的社会中的法律。国际法缺乏三种机构,而这三种机构恰恰是成熟的国内法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这就是:司法机构、执法机构和立法机构”;“国际法的这些缺陷虽然十分严重,但也不能因此而不将国际法当作法律,国际法具有法律的所有基本特征”。^[14]同样,摩根索也指出,承认国际法的存在并不等于说它作为一种法律体系与国内的法律体系一样有效,尤其不是说它在调节和限制国际舞台上的权力斗争方面是有效的。事实上,国际法就像在某些有文字记载以前的社会,诸如澳大利亚的土著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尤罗克人的社会中所盛行的那种法律一样,是一种原始类型的法律,是一种几乎完全分散性的法律。^[15]

在这种观念下,与理想主义者相比,古典现实主义者不仅对国际法的独立性提出怀疑,也对它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表示出极大的轻视(虽然也承认它们对国际政治有“微弱的”制约作用)。一方面,在他们看来,国际法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其只是国家追求权力的陪衬物,即“国际法除了作为攫取权力的服务工具外,它们实际上毫无用处”;^[16]“国际法比法律的任何其他分支,都更受政治的左右”^[17]。为达到追求权力与安全的目标,摩根索等人甚至认为,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际道德,都可以被肆意践踏,因为对自身利益是

[12] 无疑,卡尔、摩根索以及凯南等现实主义学者对国际法的观点,影响了同一时代的国际关系学者对待国际法的总体看法。当然,也是对国际法理论界,包括对国际法学界各种研究命题,提出了有力的挑战。面对现实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强势,许多国际法学者做出了学术上的“适应性”调整。虽然这些学者反应不一,但归结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点:首先,他们努力将国际法与国际政治更紧密联系,或将法律视为政策科学(law as policy science),或将法律视为系统的政策科学(law as systemic policy science),或将法律程序与实用主义紧密相联(Pragmatism and legal process)。其次,作为上述任务的一部分,他们重新定义或解释了法律的构成(form),在实体法与程序法上搬进一些政治因素,并有重程序而轻实体研究的取向。最后,他们重新评估了国际法的基本功能,认为它们对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具有引导和约束方面的基本作用。而且,他们试图论证在有强制力保障的情况下,国际法的基本功能可以延伸到更广泛的领域,包括沟通、保证、监督以及例行程序等等。在这一时期国际法学的变革者中,以声称其所发展的理论是“为政策定位的法理学”(policy-oriented jurisprudence)的“纽黑文学派”(the New Haven School)的观点与影响最为引人注目。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探讨古典现实主义对冷战时期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实践影响。See Anne-Marie Burley,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Dual Agenda,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7, 1993, pp. 211-214; Myres S. McDougal and Harold D. Lasswell,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ppraisal of Diverse Systems of Public Order in International Rules: 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ed by Robert J. Beck, Anthony Clark Arend and Robert D. Vander Lug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6, pp. 111-112.

[13] J. Craig Bark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Continuum, 2000, pp. 70-71.

[14] [英]爱德华·卡尔著:《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199页。

[15] 参见[美]汉斯·J·摩根索著:《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51页。

[16] Martti Koskenniemi, Carl Schmitt and Hans Morgenthau, The Imag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Ro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edited by Michael By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3.

[17] J. Craig Bark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Continuum, 2000, pp. 72-73.

否有利才是衡量国家对外政策的标准。用他们的话讲,即是“大量的国际法得以遵守不是由于公共利益的存在或者义务的履行驱使,而是因为这种遵守有利于个体国家私利的实现。当国家的自身利益驱使它们必须作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时,国家唯一的义务就是追逐自身利益”^[18]。鉴于此,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由于国际法独立性的缺乏,试图通过国际法的途径去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纯粹是一种“误导”(misguile)^[19]。

另一方面,在古典现实主义者眼中,由于强制力的缺乏,所有的国际法都被看成是软弱的(soft)^[20]。国际法软弱无力的根源,卡尔认为有以下三点原因:^[21]第一,国际社会缺乏司法机构。国际法本身亦承认,任何法庭无权就法律或事实问题做出能够得到整个社会公认的、具有约束力的判决。常设法庭之类的机构并没有改变国际法的实质:它只是确立了一些特定义务,国家对这样的义务的接受必须是自愿的。第二,国际社会没有有效的执法机构。在某些案例中,国际法确实承认,如果发生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受到伤害的一方享有对违法方的报复权利。但这只是承认一方实施自助的权利,不是动用执法机构对违法方实施惩罚。第三,国际社会缺乏立法机构。国际条约是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在相互之间达成的契约,而不是国家作为国际立法机构的成员制定的法律,即所谓的“国际立法”是不存在的。除以上原因外,摩根索还认为,由于受到国家是否接受的意愿的限制,以及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强制性缺乏等因素的影响,注定国际法在追逐权力与安全的国际关系中基本上处于无用武之地。^[22]

总之,古典现实主义者对国际法的基本立场是:国际法一般来说能被遵守,但它们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matter)^[23]。实际上,对于冷战时代国际法的作用与国际秩序的现状,古典现实主义者表现出了极大的悲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曾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这种状况,即“在虚弱的国际法与强大的国家利益的冲突中,法律不得不低头——并且法学家们,要么向天空以及有关国家举起拳头齐唱哀伤的悼歌,要么用一种更为复杂的屈从或奉承姿态结成为国家行为的合理性辩护的团体”;“法律之所以低头,是因为它们追捧的是一种‘道德’,而不是一种‘现实’问题。实际上,法律是如此虚弱的用一种不现实的方法去规制国家行为,以至使得它们自己已经不属于现实政治中的一部分。如果国家的生存不是一个法律所关心的问题,或者更进一步说如果现有国际体系是一个连续激起生存问题的体系,那留给我们的的是一个悲哀的结论,即在关键问题上,国家仍然在践踏国际法。”^[24]

(二) 古典现实主义者对外交政策中的“法制主义——道德主义途径”的批判

立足于国际法对政治的“依附性”以及对现实影响的“软弱性”之认识,从摩根索到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都对20世纪上半叶世界范围以及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法制主义——道德主义途径”(legalistic-moralistic approach)进行了极大的批判。

在具体的批判中,凯南是表现最为积极的角色之一。首先,凯南对世界范围的法制主义外交途径提出强烈的批判。凯南指出,20世纪前半叶在世界范围内盛行的法制主义外交途径,本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却令人讽刺的换来彻底的战争之后果。实际上,法制主义使暴力更为持久,局面更加糟糕,对于政治稳定更是具有破坏性。^[25]同时,二战后“那种试图依靠《联合国宪章》等来规制国际社会的混乱以及抑制各国危险举动的想法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26]即使把视线转移到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凯

[18] Id., p. 73

[19] Robert J. Beck, Anthony Clark Arend and Robert D. Vander Lugt eds., *International Rules: 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6, p. 95

[20] Kenneth W. Abbott and Duncan Snidal, *Hard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3, Summer 2000, p. 422

[21] 参见[英]爱德华·卡尔著:《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159页。

[22] 参见[美]汉斯·J·摩根索著,肯尼思·W·汤普森修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郝望、李保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5-368页。

[23] Robert J. Beck, Anthony Clark Arend and Robert D. Vander Lugt eds., *International Rules: 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6, p. 94

[24] Id., p. 97

[25] Id., p. 96

[26] J. Craig Bark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Continuum, 2000, pp. 72-73.

南也认为美国旧时代外交政策中最严重缺陷是不恰当地强调了“法律——道义因素”，法律——道义学派忽视了政治问题的国际意义和国际稳定的深层根源。对此，凯南写道：“勿庸置疑，我认为过去的外交政策中最大的失误就是试图使用被我称之为‘法制主义——道德主义途径’解决国际问题。在过去的50年这种途径搞得美国的外交政策一遍混乱。”^[27]凯南指出，作为一个大体上对现存国际体系及其制度法则感到满意的国家，美国想不到别的国家会试图通过武力去颠覆现存的秩序。美国不仅用法制至上主义的术语为其安守现状作掩饰，而且它还辅以道德至上的说教，更增加了麻烦。美国不能面对国家利益彼此冲突这一难以应付的现实，也不去寻找最小程度上扰乱国际生活的解决办法，而指望以正式的法律准则去解决争端。然而，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里，法律过于抽象和僵硬，不如外交手段更适于调解相互冲突的利益。^[28]当然，凯南并不只是提出了业已被历史所证明的“法制主义——道德主义途径”破产的观点，而是进行了一系列“有理、有节”的批判。这种批判首先是针对法制主义外交途径的：^[29]

首先，凯南指出，这种要求各国服从一个国际司法体系，限制它们对他国侵略与伤害的可能之理念，实际上意味着必须推断各国都必须像美国一样，对它们现有的国际边界以及身份地位满意，或者至少它们愿意用国际条约来限制它们自己改变现状的冲动。无疑，这种理念之势粗略的刻画了一个只由主权绝对平等的国家组成的世界，却忽视了还存在着各种坚定的民族分离的声音可能导致的巨大变化，忽视了（至少是低估了）在很多实例中国家边界与身份的来源纯粹属于偶然的事实。实际上，民族国家模式现在不是，也不应该与不可能处于一种固定不变以及静止状态。从本质看，它是一种处于持续的变化与流动的不稳定现象。历史已经证明，人们愿意并且有能力投身于世界环境的不断改变中。但是，僵硬的法律不适应这种变化。

其次，凯南分析到，美国所提出的“世界法”（world law）之概念忽视了对其他民族进行压制或者展现权力的各种国际攻击手段的存在，这些手段包括意识形态的攻击、威胁、渗透，以及用机制装饰的国家主权的潜在威胁（disguised seizure of institutional paraphernalia of national sovereignty）。换言之，这种概念忽视了它暗含的有关傀儡国家的制度安排，以及通过此可以将强国运用非正式暴力的形式把附属国转变成傀儡国家，或者至少是对这些国家的独立性与主权的外部特征提出挑战的蕴意。这就是东欧“卫星国”的人民苦涩的看待联合国的原因，因为它们遭遇强大的邻国的统治，但依据国际法的程序却还不能将此定义为“侵略”或“威胁”。

再次，凯南认定，国际事务中的法制主义途径忽视了政治问题的国际意义以及国际不稳定的深层次原因。它假定国内战争将永远保持在国内状态而不会向外蔓延；假定每一个民族都有能力采用理智的方式解决自己国内的事务并且不会刺激它的外在国际环境；假定每一个民族都有能力组织一个合格的，并且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政府为其代言以及在国际事务中代表他们投票。换句话说，它假定国内事务永远不会变成国际事务，以及国际社会囿于各国主权平等与独立的原则对于国内的权力竞争的各种选择方案不会表示出何种偏好。

最后，凯南指出，国际事务中的法制主义途径的一个根本性错误在于其假定制裁的威胁能够阻止侵略与暴力。大体上看，它指望用集体行动的方式提供施加于违纪国家的制裁。但它忘记军事联合之效果的有限性。它忽视了在一个政治——军事的冒险行动中，任何军事的联合都将只会加大这种恶性循环，即一个将使理论上一切可能动员的军事力量动员起来，却难以因为成本问题得以控制的恶性循环。联盟变得越大，维持一个促使政治团结以及某种目标的基本条约的难度就越大。回报不断减少的法律却如此依赖于多边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至在确保国际社会稳定的问题上小国的参与能否增加大国的能力成为一个疑问。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让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的现实，即对违反国际法的制裁又必须回到过去

[27] George F. Kennan, *Diplomacy in the Modern World*, in *International Rules: 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ed by Robert J. Beck, Anthony Clark Arend and Robert D. Vander Lug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6, p. 103.

[28] See Craig Bark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Continuum, 2000, pp. 73-74.

[29] George F. Kennan, *Diplomacy in the Modern World*, in *International Rules: 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ed by Robert J. Beck, Anthony Clark Arend and Robert D. Vander Lug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6, pp. 103-105.

的大国合作或均势,也就是说国际法所支持建立的集体安全机制是无能为力的。

无疑,以上凯南对国际事务处理中“法制主义途径”所存在的理论缺陷的批判是有力的,但对于他说,批判并没有就此结束。凯南继续指出,除以上问题外,尚存在一个更大的缺陷,即法制主义途径总是不可避免的与道德纠缠在一起——假设国家可以作为道德评价的合适主体,并用绝对的对与错的概念去评价卷入国际事务中的国家行为。但是,由于在国际社会中没有一个最高的评判者,导致谁都可以愤怒的指责对方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并认为自己与之相比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当这种愤怒转变成一场军备竞赛,以及紧接着的一场在高尚的道德原则名义下进行的战争,结果是加剧了暴力冲突。无疑,这比起一场纯粹基于国家利益的战争来说,将使暴力更为持久并对政治稳定更具破坏性。^[30]

至此,凯南的结论是:毫无疑问,如果本国的目的与任务是体面的(decent ones),不对他国人民怀抱傲慢或敌意,或者没有任何优越于他人的错觉,将使得我们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得到一个比主张普遍公法或绝对道德原则更加美好的世界。^[31]

(三) 古典现实主义对国际事务处理的方式选择

如果国际事务的处理中“法制主义——道德主义途径”是一种已被历史证明的失败途径,那各国以及国际社会必须选择怎样一种行之有效的外交方式呢?无疑,古典现实主义并不是一种站在纯粹的批判层次之理论,它的意义更在于对现实的国际关系的有效治理之探讨。

1 古典现实主义对外交手段的推崇

在对国际关系的调整手段上,古典现实主义基本上选择放弃或贬低国际法,而崇尚外交等传统调整手段。对此,就如乔治·凯南指出:“历史表明,人类对于改变他们的世界环境的愿望与能力是不断变化的,而诸如国家般的人类组织形式只有随着这种愿望与能力一起变化才符合逻辑。国际体系的功能不是通过施加法律的‘紧箍咒’(strait jacket)来制约这种变化,而是去辅助它,或是加快转变过程,或是排除障碍,或是缓解冲突等等。但只有外交手段这种传统方法,才能承担起这一重任。相比之下,国际法太过抽象,欠缺灵活,对于非预期的需求难以调整。”^[32]

同样,作为古典现实主义巨匠的摩根索在贬低国际法的作用之余,也对外交等调节国际关系的传统手段赞叹不已。在他眼中,成功的争取均势和国际稳定的一个最好途径是通过和解实现和平,而基本工具就是外交。^[33]在他看来,外交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所能提供的维护和平的最佳手段;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是促进国家利益的主要方式之一。用他的话讲,即是:“我们曾经有机会强调过外交作为国家强权的一个因素极端重要。外交对维护国际和平的重要性只是那个总功能的一个特殊方面。因为以战争告终的外交未能实现其首要目标:通过和平手段促进国家的利益。”^[34]而且,摩根索还总结了外交政策的四项任务与九条准则,试图指导现实中的国家外交政策。

具体的讲,摩根索认为,外交的任务有四个方面,具体是:第一,外交必须根据可用于追求目标的实际具有或潜在具有的实力来决定自己的目标;第二,外交必须评估其他国家的目标,以及它们可用于追求这些目标的实力;第三,外交必须确定这些不同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容的;第四,外交必须利用适合于追求其目标的手段。摩根索强调,这四项任务构成一国对外政策的基本要素,它们是在任何地方,还是任何时间,都应具有的基本内容。外交未能完成这些任务中的任何一项,就有可能危及对外政策的成功并由此危及世界和平。^[35]

同时,摩根索认为,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为了促进国家利益,一国外交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遵循一

[30] Id., p 106

[31] Id

[32] George F. Kennan, *Diplomacy in the Modern World*, in *International Rules: 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ed by Robert J. Beck, Anthony Clark Arend and Robert D. Vander Lug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6, p 103.

[33] 参见[美]汉斯·J·摩根索著:《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656页。

[34] 同上。

[35] 同上,第656-658页。

些重要的准则。为此,摩根索总结了九条准则,前面四项为基本原则,后面五项为妥协的前提条件:第一,外交必须放弃十字军精神,消除战争危险,促进道义一致,以有助发展维持和平的外交;第二,外交政策的目标必须根据国家利益来界定,并须以足够的实力予以支持;第三,外交必须从其他国家的观点来观察政治舞台;第四,国家必须愿意在所有对它们非重大的争论问题上妥协。然而,只有当双方的国家利益得到确保时,这种妥协才是可能的;第五,放弃虚幻的无价值的权利,争取实质性的真正利益;第六,永远不要把自己置于“退而丢脸”、“进而受损”的境地;第七,绝不允许让一个弱小的盟国为你作出决策;第八,武装部队是对外政策的工具,而不是它的主人;第九,政府是舆论的引导者,而不是舆论的奴隶。^[36]

2 古典现实主义对均势机制的青睐

古典现实主义者极力排斥集体安全机制在维护国际和平方面的功效,并推崇势力均衡这种稳定国际环境的传统手段。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为什么集体安全机制不能够发挥出维护国际和平的功效呢?那是因为集体安全机制的运行受到许多前提条件的限制。

例如,摩根索指出:“集体安全作为防止战争的机制发挥作用,必须实现三项假设:(1)集体体系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集合占据优势的力量来反对任何潜在的侵略者和侵略者联盟,以使它永远不敢向集体体系所捍卫的秩序提出挑战;(2)至少其联合的实力符合第(1)条要求的那些国家对于它们要捍卫的安全必须有共同的安全观念;(3)那些国家必须使它们冲突的政治利益从属于所有成员国集体防务所界定的共同利益。”^[37]而在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在资源稀缺及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系统中,这些条件都不可实现,历史也已经证明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成功的。相反,能够起到现实作用的仍然是势力均衡机制。因此,对于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与自助所产生的安全困境,古典现实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国际冲突无可消除,解决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的办法惟有均势。“国际均势只不过是一个社会普遍原理的特定表现而已,一切由若干自主单位组成的社会,其各个组成部分所以具有自主性,就是由于这一社会普遍原理;均势和旨在维持均势的政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中,它是个必不可少的稳定因素。”^[38]

对此,怀特也指出:“历史清楚地表明,均势是大多数国家在多数情况下寻求自我保存的政策。只要没有国际政府,国家因此而主要专注于自己的生存,国家就会去寻求在各自间维持某种平衡。战争成为调整平衡的最终手段,这种情况并非少见。至于有多少次均势避免了战争,人们则不记得了,因为均势不是战争的‘动因’,无论人们选择了以怎样的方式寻找战争起因,它都存在于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中,即由均势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并使之有序的政治环境。替代均势的选择不是全球无政府状态就是全球霸权。稍稍思考便可看出均势比前者更可取,而且尚未有人说服我们后者比均势更可取,从而应当接受后者。”^[39]

3 凯南的“遏制”思想

无疑,二战后古典现实主义的均势理念的最直接体现就是来自古典现实主义大师凯南的、对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遏制”思想。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大使的凯南通过发自莫斯科的八千字电报,首次提出了美国应对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必需实施遏制政策——即考虑到苏联政治与经济基础的脆弱性,美国必须遏制其军事、政治以及道德等方面影响的世界扩张。后他又以“X先生”署名,以《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为题,将这些内容发表在非常有影响的国际关系期刊《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的1947年7月号上。

在这篇文章中,凯南首先论述了苏联领导人必然选择实行共产主义扩张的外交政策的两个根源,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历史环境。苏联成立后的遭遇西方敌视的历史环境,支持苏联有关自身必须面对一个敌对的外部世界的印象,而独特的意识形态导致其形成有关国家作为意识形态实体,注定肩负

[36] 同上,第659-690页。

[37] [美]汉斯·J·摩根索著:《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533页。

[38] [美]汉斯·J·摩根索著:《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39] [英]马丁·怀特著, [英]赫德利·布尔、[英]卡斯滕·霍尔布莱德编:《权力政治》,宋爱群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着将意识形态扩展到世界尽头的理念。^[40]同时,凯南从美苏两国的实力地位和国家利益出发,强调美苏对抗不可避免,主张美国须以“遏制”对付苏联的“扩张”。为此,凯南总结道:“很明显,美国不能指望在可预见的将来能与苏联政权建立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在政治领域,美国必须继续把前苏联当作一个竞争者,而不是一个合作伙伴;必须预期到苏联的外交政策不可能存有对和平与稳定的长久热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世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对长久和平共处的信任。相反,美国必须实施谨慎和持久地削弱和瓦解竞争对手的所有影响以及权力的遏制政策”;^[41]“总而言之,我们的政策必须指向在欧洲和亚洲恢复均势。……必须加强共产党人正在攻击的国家内部的、自然的抵抗力量,而这在根本上已经是我们政策的基础”^[42]。

至1948年底,凯南已清晰与具体的提出了遏制政策的三大步骤:^[43]第一,通过鼓励受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的内部自信来恢复均势,为此必须实行长期的经援计划;第二,利用莫斯科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减少苏联将势力投射到国境以外的能力,这是立足于共产主义不是或者不必是独立现象的假设;第三,借以时日,逐渐修正苏联的国际关系思想——亦即让苏联领导人确信,学会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上生活,要力图按照他们自己面貌改造世界更能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以期导致谈判解决突出的分歧。

总之,凯南的电报和文章安排了美国二战后以“遏制政策”为核心的外交框架,为战后可供美国官方所选择的阻止所谓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的一项战略规划。^[44]在凯南提出遏制学说后,这一战略思路立即受到美国政府的青睐和推崇。可以这样说,遏制学说直接导致了美国遏制政策的出台。

三、古典现实主义与冷战时期安全领域的国际法及国际组织

二战后联合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理想主义思想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外交活动上的最后一次直接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构建的努力。随之而来的冷战与遏制政策,更多的体现了古典现实主义的有关思想在外交实践中的影响,也深刻的影响着国际公法的发展。具体的讲,古典现实主义有关权力决定利益,国家对外政策即为攫取权力的观点,以及对国际合作前景的悲观看法,进一步助长了美苏大国在处理东西方国家关系时的冷战思维,也影响到它们对南北方关系的处理,从而对安全领域的国际法的发展以及国际组织的运转发生不利的现实影响,或者说古典现实主义可以为这一时期的安全领域的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许多现象提供一种来自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的诠释。

(一) 冷战时期安全领域的国际法被“扭曲”现象

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对象总体上局限在所谓的“高级政治”,即国际政治领域而不是国际经济领域,因而,该学派的理论主张在国际关系的实践对国际法的冲击首先表现在安全领域的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方面。如前所述,对于国际关系,古典现实主义者们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为

[40] See George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i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ed by Marc A. Genest, Belmont: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1996 pp 84-94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原版影印本)。值得注意的是,凯南在论述意识形态的时候,强调意识形态可以作为苏联领导人对业已决定的行动的一种辩护,而非行动的指南——这是他与理想主义者对待意识形态的立场的区别之处。更具体的讲,凯南并不把马克思和列宁有关意识形态的著述视为预测前苏联行为的可靠指南,而是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产物,而非社会政治现实的一个决定性要素……它的影响是在背景上着色、表达的方式和贯彻的方法上面”。同时,凯南指出,意识形态是一个很难定型的东西,以致“领导可随意为了策略目的而推出他发觉有用的论点……并且要求整个运动的成员们忠心耿耿和毫无疑问地接受这论点。这意味着真理并非恒常不变,而是实际上如何被苏联领导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它完全谈不上绝对和永恒”。参见〔美〕约翰·加斯迪著:《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石殷弘、李庆四、樊吉社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版,第33页。

[41] George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i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ed by Marc A. Genest, Belmont: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1996 p 94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原版影印本)。

[42] 〔美〕约翰·加斯迪著:《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石殷弘、李庆四、樊吉社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版,第36页。

[43] 同上,第35-71页。

[44] See George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i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ed by Marc A. Genest, Belmont: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1996 p 83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原版影印本)。

了保护自己的生存权、领土主权和军事安全,总是要追求权力。这种思想反映到国家对安全领域的国际法的态度上,就是它们趋向于排斥因为安全领域国际法的遵守而影响到国家利益的攫取可能,并通过符合自身利益的法律解释而扭曲国际法。

从实践看,在冷战时期,大国,尤其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使安全领域的国际法符合自身的国家利益的目的,经常对它们做出不同于本义的“扭曲”理解。就如西方学者指出,这一时期在好几个清晰可辨的方面“扭曲”了安全领域的国际法:^[45]第一,由于“民族解放战争”之类的例外,国际法中对单方面使用武力的正式禁止被忽略掉了。而这种做法,反过来又造成并维持了一些相反的例外,“为自由而战”就是典型。例如,在这种口号下,里根政府支持了与安哥拉社会主义政府作战的游击队。第二,在冷战时期,对于普遍性国际法造成很大冲击的“有选择干预的对称理论”——包括前苏联奉行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与美国前总统里根提出的“里根主义”——得到了发展,并被这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大胆地运用。而且,战争法这种在历史上主要用来降低战争的野蛮程度,并明确区分交战国与非交战国的普遍性国际法,也由于冷战时期核武器的出现,承受了沉重的冲击,这种冲击远远超过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现代技术在战争中的运用而造成的、对战争法的伤害程度。第三,在美苏争霸的形势下,间谍和其他秘密活动几乎不受惩罚。从美国国内情况来看,人们也许可以加上这样一点认识:美国安全政策与外交政策之间含糊不清的界限导致了里根时代外交政策的“个人化”,就像“伊朗门丑闻”所证实的那样。第四,就像北约与华约两大相互对抗集团之间的持久对抗一样,各自都有自己的法律体制,这时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分野失去了其重要性。同时,中立也失去了其政治与法律上的意义。

实际上,以上对冷战时期安全领域的国际法被扭曲理解的四个方面只是一个简要概括,真实情况应该涵盖更多方面。按照自身利益去解释安全领域的国际法,国际法成为个别国家攫取自私利益的工具,正是摩根索等古典现实主义对安全领域国际法能够被遵守的一种理论解释。

(二) 冷战时期国际安全领域的普遍性国际组织的运行不畅——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运行为例

古典现实主义对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安全必须依赖自助行为的强调,在实践中的影响不仅是体现在使得现存国际法被扭曲,也体现在个体国家(尤其是超级大国)严重不相信国际组织在维护国际公共利益以及集体安全机制维护和平的能力,强调的是靠自身的发展,从而使得主要国际组织所承载的国际制度运行不畅——冷战时期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运行就是典型。具体的讲,冷战时期作为国际法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的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窘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大国一致”原则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有效运行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无疑,集体安全制度的建立与运作是基于这样的假定:在国际安全方面,国际组织的所有或绝大多数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共同利益、共同认识以及共同行为。然而,无论是设想所有或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国际现状对己有利或是符合正义的,还是设想它们会将本国利益等同于由普遍安全来定义的国际共同利益,或者随时愿意将本国利益从属于维持普遍安全的需要,并且愿意承受由此而来的战争危险,这显然是有违常理的。而且,要相信这些国家会为集体安全机制而放弃对权力因素的传统控制,由此在最为关键的安全或军事政策领域放弃主权,同样是不符合一般情况下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的。^[46]同时,集体安全机制的另一项前提,即可被用作维持现状秩序的国际集合力量占有压倒性优势,以致足以威慑或击败侵略国的假设,也不符合实际上并非罕见的情况,即侵略国经常是占有国际力量总和的很大一部分。换句话说,即使假定的所有条件都已经具备,集体安全机制也难以遏阻或挫败真正的强国或强国集团的侵略行为。^[47]

而且,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是传统均势与集体安全思想的共同产物,古典现实主义的思想在理想主义

[45] 参见〔美〕熊玠著:《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余逊达、张铁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9页。

[46] 参见门洪华著:《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47] 同上。

提出的集体安全方案中留下深深的印迹。例如,它从一建立起就无意适用于五个常任理事国,而后者却是最足以威胁其他国家乃至国际安全的因素,一旦大国漠视乃至纵容侵略,国际安全的维护不过是一纸空文。因此,作为一个仲裁者,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也并非不偏不倚的,实际上是以一种双层结构作为它的基础:一层是由形式上平等的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大会;另一层是由几个大国政府组成的安理会。^[48]无疑,这种结构表明了该安全机制的非民主思想,是大国的现实主义做法的表现。实际上,作为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是大国一致原则(即否决权),即是权力均衡这一古典现实主义核心概念在集体安全制度的设计中的最充分的反映。当然,也许否决权的出现是基于这样的假定:即大国可以确保它们之间的合作,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使用否决权。但这种制度的设计的效果却可能呈现出三种可能:其一,排除安理会对常任理事国施加强制措施的可能;其二,排除安理会对跟常任理事国利益紧密相关的非常任理事国施加强制措施的可能;第三,将根据宪章第 51 条试图实施集体自卫行动的可能性最小化,因为很难设想在许多国家采取集体军事行动的事例中,没有至少一个常任理事国卷入一方或另一方。^[49]从冷战时期的实践看,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分歧导致否决权曾经频繁使用,严重阻碍了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有效运作。

在冷战时期,在使用否决权方面,安理会每个常任理事国都有行使记录,但美苏两国使用的次数占到绝大多数。这时,否决权实际上成了美苏为首的东西方进行冷战、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50]据统计,从 1946 年到 1986 年的 40 年间,安理会内总共行使否决权 223 次,平均每年 5.57 次,其中 95% 以上是美苏两国使用的。^[51]更具体的讲,由于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把持了联合国,联合国成了它的“表决机器”,当时行否决权的主要是前苏联。据统计,从联合国成立到 1955 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共行使否决权 82 次,其中前苏联占 79 次。^[52]从 1956 到 1965 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共行使否决权 31 次,其中前苏联使用否决权共 26 次,而美国在同期没有使用一次否决权。^[53]这一段时期前苏联频繁使用否决权,主要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的美苏争霸中,由于实力的劣势使前苏联不得不处于守势。在二战结束后的头 20 年,前苏联在军事与安全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是,其不仅需要巩固相对而言阵脚不稳的社会主义阵营,也需要遏制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不断扩张与实力膨胀。因此,这段时期前苏联在安理会频繁使用否决权,阻止安理会通过对其不利的决议,从而达到维护其军事与安全利益的目的。

联合国成立至 1970 年,美国从来没有在安理会使用过否决权,不过这并不表示其在这个时期不需要利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同前苏联进行斗争。事实上,在 1965 年安理会理事国由 11 个国家增加到 15 个国家之前,安理会理事国中绝大多数都是同美国站在一起的,而且除了前苏联外的其他常任理事国都是美国的盟友,因此美国根本不需要使用否决权,就足以使安理会否决对其不利的决议案——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暗藏否决权”(hidden veto)。^[54]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大批新独立的国家加入联合国,且 1965 年安理会成员国的数目从原先的 11 国增加到 15 国,这使得安理会中的中立国和支持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的国家增多,美国因此越来越难以控制安理会,其“暗藏否决权”也就逐渐消失。因而从 1970 年开始,美国在安理会频繁使用否决权。在 1970—1982 年间,美国在安理会使用过否决权达 35 次,比其他常任理事国都要多得多。^[55]在 1980 年至 1988 年 5 月 10 日统计,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共行使否决权

[48] 同上,第 194 页。

[49] 参见[美]汉斯·J·摩根索著:《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4—385 页。

[50] 参见张小明著:《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5 页。

[51] 同上。

[52] 参见李铁城主编:《联合国的历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13 页。

[53] 参见梁西著:《国际组织法(总论)》(修订第 5 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8—149 页。

[54] 张小明教授认为,认为美国在安理会“暗藏否决权”是有根据的,单在 1958 年那一年,在安理会中,美国及其在北约与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的盟友就拥有 8 票,只有伊拉克和瑞典两国在东西方斗争中持中立态度。次年,意大利(北约成员)取代瑞典,突尼斯(中立国)取代伊拉克,成为安理会成员国,美国及其盟国拥有 9 票,比上一年还多一票。这样,美国可以通过安理会的绝对多数票,推翻它所反对的任何决议案。特别是使用“暗藏否决权”,阻止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决议案在安理会通过。参见张小明著:《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8—199 页。

[55] 参见张小明著:《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9 页。

47次,其中美国多达30次,接近总数的三分之二。^[56]在这个时期,美国多次使用否决权,不仅是维护自身利益,也袒护自己的盟友,同时反对前苏联及其盟友。例如,在安理会通过有关巴拿马运河、谴责南罗德西亚白人政权以及南非和以色列的决议案时,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1976年统一后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前苏联和古巴支持的安哥拉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等等问题上,美国都行使了否决权。^[57]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否决权的频繁使用使得联合国在冷战时期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特别是在涉及东西方斗争领域,它更是无能为力。从现实看,整个冷战时期,地区冲突不断、战乱频繁,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些地区冲突大多与东西方冷战、超级大国的插手有关,而冷战破坏了“大国一致”原则,联合国关于制止侵略和军事冲突的集体安全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在东西方冲突色彩较浓的地区冲突中(除了个别例外,比如朝鲜战争),诸如柏林封锁和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安哥拉内战、阿富汗战争等等,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

2 区域组织的集体防务机制架空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

对于区域性争端,有时候区域办法或区域性国际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可能较联合国程序更为优越,因为区域内的国家对本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状况更为熟悉,也更为了解事件背景、争端方真实要求和解决冲突的合适途径。因此,鼓励区域办法,协助维持和平,成为《联合国宪章》制定时的一种价值观或共识。^[58]《联合国宪章》规定,在符合联合国宗旨与原则的前提下,鼓励会员国在将地方争端提交安理会前,应依据该项区域办法或由该项区域机关力求和平解决;而安理会也应鼓励其发展。但是,自1945年以来,关于《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区域办法”如何实行的争论从未停息过。因为,无论是区域性国际组织内的成员意见不同,还是区域组织内占支配地位的大国采取不合作态度,或者当本质上属于区域性质的争端超出区域范围时,区域办法或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争端程序难以发挥作用;而世纪之交发生的前南斯拉夫冲突与科索沃危机,更是表明区域大国或区域组织也有可能假借该规定,架空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危险。因此,理顺区域办法程序与联合国程序,或者说区域国际组织与联合国机构的关系将是宪章有关“区域办法”的规定在未来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59]

实际上,在冷战的紧张氛围下,大国为了满足权力斗争的需要,操纵其主导的区域组织从而规避与架空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现象更是难以制止。当关于《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区域办法”的争论尚未停息时,美洲国家组织甚至直接从立法上获取超越,即在1948年于哥伦比亚波哥大通过的《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20条明确规定:“美洲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国际争端,在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之前,必须由本宪章所规定的和平程序处理。”^[60]显然,这是在为主导该组织的大国,使用区域组织的“集体自卫”回避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控制提供了“合法性”借口。其后,美国对古巴实施的隔离措施事件将此变成事实。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后,美洲国家组织随即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根据1947年《里约热内卢泛美互助条约》一致同意,“各个成员国,采取一切措施,包括单独或集体地使用武力,确保古巴政府不能继续从前苏联得到可能危及美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军事物资和相关设备”。同一天,肯尼迪总统签署了3504号公告,授权美国军队与国防部长采取任何适当措施,包括在距古巴合理的距离内,划定禁区和制定航线,任何驶往古巴的船只将被拦截和接受登临、检查;对违反规定的船只予以扣留等等。直至1962年11月20日,美国判定导弹没有继续运往古巴和已安装的导弹已被拆除后,宣布取消隔离措施。^[61]

尽管对于这种隔离措施的合法性在法学界至今仍然争论不休,但至少说明了一点:当用区域组织的集体安全机制代替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时候,后者的威信以及效用能否发挥不得不面临巨大考验。在这

[56] 参见梁西著:《国际组织法(总论)》(修订第5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57] 参见张小明著:《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58] 参见门洪华著:《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59] 同上,第190页。

[60] 有关《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的中文译本,可参见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924-976页。

[61] 有关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对古巴的隔离措施事件以及国际法学界对其合法性的争论,详见杨泽伟著:《宏观国际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301页。

一事件上,一些美国学者用现实主义的观点对其“合理性”进行了辩护,^[62]这也反映出美国在处理该事件时以及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与区域组织的关系上所持有的现实主义态度。

3 排除对“国内暴力”的干涉影响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运作。

无疑,古典现实主义有关主权的思想可以拿来解释二战结束时国际社会起草《联合国宪章》时的某些思路。在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只是围绕权力的斗争,每个国家都是自助的,主权是绝对不可侵犯的;同时,反对外来干涉的对象不仅包括国家,也包括国际组织,也就是说没有哪个国家的国内事务能够容忍别国或国际组织的干涉。^[63]

在这种认识下,《联合国宪章》专门排除了对国内问题的管辖权,宪章第一章“宗旨与原则”的第2条第7段包含了排除“国内管辖权”的条款。^[64]但是,国际社会的冲突,即使不完全是,但也在很大程度是国内冲突外溢的结果。^[65]《联合国宪章》起草者的思路即宪章所禁止的核心是指向侵略,而且,在1945年时国际社会突出的问题也确实是国家之间的冲突。然而,二战结束以后频繁发生的并不是国家之间冲突,却是国家内部暴力问题。无疑,这是起草者完全没有想到,因而在宪章中完全没有提到的。相反,《联合国宪章》把国内暴力仅仅视为“国内管辖事项”,也就是说其不在法定的国际干涉之内。但实际上国内暴力所导致的国际冲突与安全威胁,在二战结束以后是屡见不鲜,这是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所未能预计到的。^[66]这时,《联合国宪章》排除介入国内冲突的做法表面上遵守了国家主权原则,却使得许多国内冲突已经危及到各个方面的国际法遵守问题时,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却束手无策——除非能使它相信这些冲突是国际上所关注的问题——也助长了大国干涉这种可能破坏普遍国际法的行为的蔓延。例如,这一时期的南非问题,尽管它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也不断外溢到其他非洲国家;同样,北爱尔兰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内部的冲突也不在联合国干涉之列,尽管它们可能已经触犯国际人权法、战争法等普遍国际法。

诚然,从现实的眼光看,把国内冲突排除在联合国的职权范围之外或许是明智之举。如果各国内部的各个派别都将争端提交给国际机构裁决,那么国际机构将无法招架,因为大多数国家都存在不满的少数派或多数派,而其中只有某些派别在国际社会中起着关键作用,大多数派系的争端则更宜通过国内程序来解决。^[67]问题就在这里,许多国内冲突已经严重侵犯到国际法,如种族灭绝与种族隔离措施等等,这个时候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不采取行动显然与其职责不相适宜。同时,许多发端于国内的冲突外溢到了国际社会,联合国的坐视不管给予了大国进行干预的借口,这种干预有时是应邀进行的,有时是大国自己主动进行的。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它们可以利用别国的国内冲突使局部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国际法与联合国的权威受到挑战,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却无权裁决与运作。同时,解决冲突的国内手段经常带有高压和暴力的性质,这时国际人权法亦受到挑战。

总之,在冷战期间,无论是大国不负责任的频繁使用否决权,还是区域组织的集体安全机制受到大国

[62] 在1963年美国国际法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的第57届年会上,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用现实主义观点为美国的“对古巴隔离事件”进行了有力的辩护。See Acheson, Remarks in International Rules: 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ed by Robert J. Beck, Anthony Clark Arend and Robert D. Vander Lug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6, pp. 107-108.

[63] 古典现实主义的主权学说是以霍布斯思想为基础的。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理性、自私的个人都以自身安全为最高行为准则,拥有可用于自保的一切无限制的“自然权利”,但这必然导致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在冷战阶段,渊源于霍布斯思想的现实主义主权观在西方大国也颇有市场。在这里,“主权”和“无政府状态”既是该理论的两个主要范畴,也被视为某种不证自明的出发点。既然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那实际上意味着主权的对外扩张是在一个没有超级权威约束的状态下进行,也意味着主权不受外来任何干预,这显然是一种矛盾的逻辑。不仅如此,现实主义者还坚持了主权不可分的观点。如摩根索认为:“认为主权可分的观点,其实是政治现实与政治意愿两者的矛盾在意识形态的表现。……然而,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放弃‘部分国家主权’这种主张,远不是一项理性真理的表达,也不是政治经验的现实反映。它只相当于一种劝告,要人们闭上眼睛,做既能吃下一块蛋糕,又能留下这块蛋糕的美梦。”有关霍布斯与摩根索的观点,参见[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4-96页。参见[美]汉斯·J·摩根索著,肯尼思·W·汤普森修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郝望、李保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7页。

[64] 参见《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

[65] [澳]约翰·W·伯顿著:《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马学印、谭朝洁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66] 参见门洪华著:《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

[67] 参见[澳]约翰·W·伯顿著:《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马学印、谭朝洁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的青睐,以及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对国内暴力的无奈,都在表明一个事实:冷战期间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远远未能发挥出既定的效果。究其原因,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是古典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共同影响的产物,无论是理想主义的本身缺陷还是古典现实主义的消极影响,都可能使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运转不畅,尤其是古典现实主义的影响方面。而二战结束与冷战开始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中古典现实主义的影响因素所导致的后果逐步显现。这时,美苏为了最大限度的攫取世界范围的政治与军事权力,不约而同地把联合国开辟为新的战场。在这个新的战场里,双方关心的不是联合国宗旨与原则的维护,也不是联合国法律机制是否得到遵守与良好运行,而是如何把联合国作为追求霸权的工具。为了最大限度的攫取国家利益,联合国法制,尤其是集体安全机制经常成为它们肆意糟蹋或者任意揉捏的对象。

(三) 冷战时期“权力利益观”在超级大国的外交实践中的影响

就如摩根索认为,大量的国际法得以遵守不是由于公共利益存在或者义务的履行,而是这种遵守有利于个体国家的私利的实现。在国家的自身利益驱使它们必须作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时,国家唯一的义务就是追逐自身利益。^[68]可见,古典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是一种“权力利益观”。依据这种利益观,许多古典现实主义表现对国际法作用的肆意贬低与否定。例如,凯南在理论上不仅强烈批判了美国外交事务中的“法制主义——道德主义途径”,也对遏制战略作出了理论概括,提出美国应该更加现实,更加注重“国家利益”,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是它们真正能够认识和把握的全部真谛。^[69]在实践上,依据这种权力利益观,古典现实主义强调外交与均势的作用,并贬低或否定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机制的作用与功能。而且,为了攫取个体利益,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尊重也可以降到最低,即“为了国家的生存,个体国家必须获取对于别国的相对获益,为实现这种目标的任何行动都是正当的”。^[70]

最典型的是,对于美国的对外干涉政策,理想主义者一般会用“人权”、“民主”、“自由”等冠冕堂皇的口号来辩护,这个时候国际法与国际道德经常是其用来标榜自己行为“合法性”的工具。例如,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半岛,至少在道义上美国运用了所谓反对共产主义“邪恶入侵”,以及维护民主世界的和平等意识形态口号作为支持;在国际法上它们也以维护《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为“尚方宝剑”。这样,这种干涉行为至少在表面上是对当时的国际法律秩序的维护,至少在形式上尊重了国际法的权威,以及符合国际道德的标准。也就是说,国际法与国际道德始终是理想主义的外交行动必需考虑的因素,在表面看甚至是极其重要的因素。而古典现实主义不同,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外交行动是否与本国家利益紧密相关,而更少考虑国际法或国际道德的如何取向。如对前苏联的遏制政策,凯南与摩根索主张的是成本更小的政治遏制,而不是代价巨大的军事打击,因为这样才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正因为如此,久拖不决、代价高昂的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也遭到摩根索、凯南等人的猛烈抨击。实际上,在“权力利益观”的感召下,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利益远大于成本,则值得干涉——即使干涉本身就是对现行国际法律秩序的破坏——而不管是否涉及所谓“维护联合国法律秩序”以及“反对共产主义邪恶入侵”等理想主义者首要考虑的因素。反之则放弃干涉,即使现行的“国际法律秩序”正遭到破坏也坐视不理。如凯南等宣称:“美国没有理由觉得自己有义务去保护任何国家,这种假设的责任将会成为它难以承担的负担。”^[71]同时,对于卡特政府推行普遍人权运动与人权立法,摩根索也大力抨击,他认为这是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一方面是全球普遍接受的人权没有可能加以实施,这样成本大于收益;另一方面是美国在全世界有多方面的利益,很多比人权更为重要。^[72]

简单地讲,如果说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是对现有国际法以及国际道德的尊重,那

[68] J Craig Bark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Continuum, 2000, p 73

[69] George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 89, 104. 转引自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3 页。

[70] Vincent Ferraro Ideal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Talk to the Antioch New England Graduate School Keene, New Hampshire, 3 March 2003.

[71] [美]肯尼思·W·汤普森著:《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耿协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5 页。

[72] 参见 [美]肯尼思·W·汤普森著:《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耿协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3 页。

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已是将此降为最低点。对此,在1963年美国国际法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的第57届年会上,针对国际法学者围绕“古巴隔离事件”而展开的合法性问题的热烈讨论,作为主持人的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直接用现实主义观点进行的最后点评可见一斑。他点评到:“今天,很多国际法学者都在对古巴隔离事件进行讨论。例如,哈特教授运用法律制度‘无孔不入’的观点认为必须用法律来判断所有问题;另一些学者用更具体的条约或协定来试图判断这个问题。期望得到什么呢?很明显,对于这种行动的‘合法’还是‘非法’的简单回答是绝对找不到的。然而,根据我的判断,隔离措施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是一个用国际法的术语能够解释的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古巴隔离事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美国的权力、地位以及威望已经受到了挑战;而且纯粹的法律已经不能解决这样一个涉及到主权的根本权力方面的问题。……国家的生存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然而,在古巴隔离事件中,我们也看到法律原则的影响。这些原则是缓解一个可能发生的冲突的紧张状态而设计的。这种程序使得更激烈的行动得以理性的延迟,即创造了一个冷却期让双方好好反思。美洲国家组织的重要性在于程序上对集体行动的强调以及宣布了一个公开谴责。……在去年10月,美国面临一个关系着它的自身利益与海外利益的外交与程序上的严重问题。它所采取的行动是一种正当行动。这种‘正当性’(right)意味着不仅仅是一种合法性的辩护,或者说比合法性辩护更为成功。美国运用了一种符合伦理约束的方式解决了这个严重的外交问题。作出这种决定的最复杂的一面是怎样比较与衡量一个涉及各种冲突因素的难题。……作出这个决定的智慧在法律上并不能找到,而是必须依据判断。一般来讲,特定的法律原则并不能决定每一个具体的案例。”^[73]无疑,在艾奇逊的现实主义视角下,当涉及到美国的根本利益时,一切外交政策,甚至发展到强制措施与武力威胁,都符合“合理性”或“正当性”,这时考虑国际法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当然,冷战时期“权力利益观”在外交实践中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美国方面,前苏联的对外政策也与此暗合。事实上,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外交政策都在追求使别国皈依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一目标,并支持那些皈依者,企图通过这种策略取得超越对方的相对权力。这一时期,作为扩张各自的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权力斗争的一部分,大国一直从事着持续不断的地区性争夺,如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古巴、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菲律宾、萨尔瓦多等,屡屡成为争夺的焦点地。“每当发生这种干涉,双方都认为对方破坏了国际法规则。同时,双方都把自己对别国的干涉说成是为了抵御对方破坏势力的颠覆。双方都动用自己能够支配的所有力量在争端地区去全力对抗。他们都自以为公正,指责对方盛气凌人、无法信任;双方变得狡猾阴险,彼此运用外交规范以外的卑劣手段,它们都把大量资源用于国防,却都感到对方的防务战略威胁着自己。双方都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标榜自己的正确,希望得到国内人民、盟国以及国际舆论的支持。”^[74]显然,这正是应验了法国外交大臣威尔斯金(Walewski)在1857年对俾斯麦(Bismarck)所说的一句名言,即“外交的重要任务就是用普遍性‘道德’或‘正义’般的言语,掩饰自己攫取国家利益的目的”^[75]。而在这种权力斗争中,无论是直接干涉当事国的内政,还是由于这种干涉而引发的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成为这个时期诸如《联合国宪章》这种普遍国际法被肆意扭曲从而得不到切实遵守的重要原因。

简单的讲,冷战时期大国的许多外交政策漠视国际法的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在美苏对峙的紧张局势下,“权力利益观”成为超级大国的许多重要外交政策的实践指导,而自私本性是这种国家利益观的基本特征。诸如否决权的滥用对联合国安理会处理国际冲突方面的负面影响,只是自私的权力利益观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发展的消极影响的一个表现,在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发展的其他方面,其一样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古典现实主义者有关对权力利益观的理论与分析,为这段时期国际法的缓慢发展与屡遭破坏,以及国际组织艰难运作等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途径。

[73] See Acheson, Remarks in International Rules 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ited by Robert J. Beck, Anthony Clark Arend and Robert D. Vander Lug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6, pp. 107-108.

[74] [澳]约翰·W·伯顿著:《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马学印、谭朝洁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75] As quoted in Vincent Ferraro, Ideal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Talk to the Antioch New England Graduate School, Keene, New Hampshire, 3 March 2003.

(四) 冷战时期“均势”思想助长了 对抗性的区域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发展, 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与普遍国际法的维护产生不利影响

对漫长的国际法的发展时期进行观察, 我们会发现, 均势原则与国际法之间始终存有这样一个悖论: 一方面, 均势的存在很多时候是国际法得以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 另一方面, 必要的维持均势的措施经常会违反国际法的原则或规则。^[76]

按照布尔的解释, 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会倾向于无视国际法的规则, 因为这种国家处于“向他国发号施令”的地位。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即那些有关主权、不干涉、外交豁免等等原则, 其发挥作用有赖于“对等”原则的效力。如果一个国家处于主导地位, 那么该国就可能无视其他国家的权利, 因为其并不担心其他国家会采取对等措施。因此, 如果要确保国际法得到遵守, 我们不能只寄希望于主导国家自愿遵守法律。这直接导致奥本海等国际法学家得出如此结论, 即“我们从万国法发展史中获得一个最根本的教训就是, 只有当国际大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均势的时候, 万国法才可以存在”。^[77] 然而, 布尔也指出, 尽管国际法的效力发挥有赖于均势的存在, 但均势的维持经常要求违背这些规则。无疑, 按照现代国际法的实践, 只有当存在着侵犯法律权利的事实时, 一个国家才可以合法地对另外一个国家使用武力。然而, 均势的维持要求使用武力或者武力威胁来应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侵害力量, 而不管该国是否违背法律规则。因此, 无论是旨在恢复均势的战争, 还是旨在维持均势的战争, 以及旨在抗击第三国的侵害能力 (不管该国是否违背法律规则), 或者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军事干涉的行动, 都可能会与国际法的原则或规则发生冲突。这时, 均势秩序的要求基本上被认为是优先于国际法的, 也被认为是优先于小国获得的利益以及国际和平的维持的。^[78] 因此, 尽管均势机制有着有利于国际法的维护的一面, 但它与集体安全机制相比, 仍然有着容易践踏国际法, 或者对国际法的发展有着消极的一面。

事实上, 二战后大多数的古典现实主义者都认为维持国际和平最好的办法是依靠均势, 也许不同的学者主张千差万别, 但他们的思想的核心却是一致的, 即只有在均势的作用下, 国际和平才有保证。均势依赖于自助原则, 自助可以使国家之间结盟 (alliance)。^[79] 实际上, “均势在历史上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并不见诸于两个孤立国家之间的均衡, 而是见诸于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同另一个联盟之间的关系”^[80]。无疑, 结盟也是一种集体行动。当然, 结盟与集体安全是不同的概念。正如亚历山大·温特 (Alexander Wendt) 指出: “在结盟关系中, 国家从事集体行动是因为结盟中的每个国家自身都感到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它们之间的合作是出于利己目的, 一旦威胁不复存在, 合作也就终止了。集体安全不是与具体的威胁或具体的时间联系在一起。集体安全体系的成员承诺互助是因为它们事先就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安全单位, 无论它们是否存在危险, 受到谁的威胁, 什么时候受到威胁。因此, 它们的军事力量对其他集体安全体系的成员来说所具有的意义不同于结盟成员的军事力量对其他结盟成员所具有的意义。结盟成员知道, 一旦结盟终结, 其盟友的军事力量就可以用来打击自己, 所以, 结盟成员相互之间存在着威胁关系, 即使这种威胁关系暂时被更大的外来侵略所掩盖, 这就影响到它们的行为选择。……构成集体安全的是集体行动的理由和开放性, 不是其成员的普世性。”^[81] 同样, 集体安全制度与结盟的以上区别, 正是《联合国宪章》与《华沙条约》《北大西洋公约》比较, 有着鲜明不同的本质意义所在。^[82] 最为关键的是, 推行均势政策必然要从绝对的国家利益观出发, 建立在军事实力之上, 这决定了必然会有着尖锐的利益冲突。这种思想在实践中最显著的反映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与维护方面。而且, 北约组织与华

[76] 参见 [英] 赫德利·布尔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 张小民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86 页

[77] 同上。

[78] 同上。

[79] See Kenneth N. Walt, *Alliances: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nduring Concepts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edited by Robert J. Art, Robert Jervis,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5, pp. 96–113.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原版影印本)。

[80] [美] 汉斯·J·摩根索著:《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 求和平》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38 页。

[81]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374 页。

[82]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当面对前苏联为代表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时, 北约典型是一种属于均势性质的结盟, 也预示着它是一个临时机构。不过, 在冷战结束以及华约组织解体后, 北约并没有随之解体, 而是向一种地区集体安全体制转变。

约组织的建立与运作依赖于《北大西洋公约》或《华沙条约》这种区域国际法,但由于它们的本质上的对抗性,我们难以认为它们的存在能为普遍国际法的遵守作出更多贡献。相反,破坏之处却是触目惊心的。

一方面,如果说集体安全的目的在于维护普遍利益,其能够保护各国主权,也尊重与维护现行国际法律秩序;作为推行均势政策的结盟就不一样,它所维护的是某种集团的利益,如果盟友中出现背离集团利益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是合乎国际道义及现行国际法律秩序的,也是不可取。这时,为了维护同盟的“纪律”(或区域国际法),作出破坏普遍国际法的行为也在所不惜。例如,“在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指导下,莫斯科声称,不论何时,只要‘反对社会主义的内部和外部势力’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复辟资本主义政权’,它就有权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东欧进行干预”^[83]。事实上,在“勃列日涅夫主义”出台之前与出台后,前苏联对于同盟的其他成员国的干预持续发生,包括二战后粗暴干涉前南斯拉夫内政、1956年镇压匈牙利起义、1956年镇压波兰十月事件,以及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等事件。无疑,维护同盟“纪律”的以上事件,无一不是与“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禁止使用武力”等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相悖的。

另一方面,冷战时期北约和华约都制定了针对对方的一整套军事战略,并且随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双方实力消长而不断调整。为了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双方都想在军事力量上压倒对方,为此展开了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加强各自内部的磋商,举行频繁的军事演习来炫耀武力。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工具,北约和华约在欧洲地区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竞赛,部署了前所未有的大量兵力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使欧洲长期处于剑拔弩张的战争阴影之下。^[84]无疑,这种紧张情势,严重影响到普遍国际法的尊重以及妨碍诸如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的顺畅运行。同时,“本质上,这两个组织是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工具,不符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并不属于《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所承认的区域机关或办法”^[85]。

此外,为了不让对方取得相对优势从而打破均势状态,争夺第三世界成为美苏的共同外交政策。事实上,为实现这种对第三世界的争夺目标,美苏两国做出了众多罔顾《联合国宪章》以及其他国际法的外交或军事行动。例如,在“里根主义”的指引下,美国对于第三世界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例如,对于非“热点”地区,美国改变越战后美军不直接介入地区冲突的方针,选择某些亲苏国家和恐怖主义“发源地”,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实施直接的军事打击。无疑,无论是1983年美国出兵黎巴嫩和入侵格林纳达,还是1986年两次袭击利比亚等等事件,都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冷战时期诸如北约与华约这种对抗性的区域国际组织的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与普遍国际法的维护产生不利影响。古典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为此种现象的产生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或提供了理论解释。

四、古典现实主义与冷战时期经济领域的国际法及国际组织

如果说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阶段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只是进入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那二战结束后国际经济立法得到了繁荣。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期间,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更多是集中在具有相同经济体制的国家之间,以及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呈现出典型的区域性质。而涉及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即东西方国家)以及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即南北方国家)的国际经济立法是稀缺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从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中找到一些解释线索。

(一) 古典现实主义有关“经济力量是实现政治权力的工具”的观点

对于“低级政治”即国际经济领域的研究,大多数古典现实主义都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有关“政治与

[83] [澳]约翰·W·伯顿著:《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马学印、谭朝洁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84] 对于北约与华约的成立目的以及冷战时期两个组织的军备竞争情况,详见蒲传著:《当代世界中的国际组织》,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131页。

[85] 蒲传著:《当代世界中的国际组织》,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经济可以分离”的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模式或思维的影响,即在他们的著作或论文中,较少涉及对经济因素的关心。不过,一位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即爱德华·卡尔,却批判了这种政治与经济可以分离的传统研究模式,并对经济政策与经济力量对权力的作用问题展开探讨。

与其他古典现实主义者一样,卡尔坚持了权力是一切政治的基础的观点,但是他的权力理论独特之处是将经济因素引入到权力概念中。卡尔的理论逻辑是,“军事力量之所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是因为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最终手段是战争。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国家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为了战争”,所以,“军事力量是国家生活的核心因素。它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目的”。^[86] 不过,“经济力量,只要与军事力量结合起来,总会成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只有最原始的战争才会与经济因素完全无关。……重商主义是一种经济政策体系,依据是一种迄今为止未曾受到质疑的命题:扩充财富是国家正常职能的一个组成部分”。^[87] 而且,为了让自己的论点能立足,卡尔对当时流行的经济与政治分离说展开了批判,他写道:“经济力量实际上就是政治力量。……因此,如果将经济与政治割裂开来,孤立地研究经济,自然是徒劳无功的”;“关于政治与经济分离的问题,如果其重要性纯属历史性的,或是纯属理论性的,那就没有必要详尽讨论了。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幻觉是19世纪自由放任传统的遗产,已经全然不能适应当今的现实。但是,在国际政治中,这种思想仍然流行。也正是在这一领域,它导致的极大的思想混乱。对于政治问题是否具有经济原因,经济问题是否具有政治原因、原料问题属于政治范畴还是经济范畴这些不言自明的事情,人们竟然也投入大量的时间予以讨论。……使用与政治脱节的经济原则来解决政治问题只能是徒劳无功的。……将政治与经济分离出来的谬误还有另外一种同样严重的表现形势,这在人们普遍使用的话语中反映出来。人们往往将‘权力’和‘财富’、‘枪炮’与‘黄油’等区别开来。”^[88]

当然,我们必需注意到的是,卡尔认为经济与政治不可分开,国际政治研究与国际经济研究不可脱节,并不是把经济看成与政治同等重要,而是将经济看成是政治的一部分,经济力量是实现政治权力的工具。对此,卡尔也毫不隐讳地指出,经济必须被视为政治的一个方面。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就可以把经济实力为国家政策服务的方法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方法的目的是为通称为自给自足的模式服务的;第二类方法是要直接加强国家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力的那些经济手段。^[89] 换言之,卡尔所称的自给自足模式即是重商主义政策的目标之一,这种自给自足不仅是保证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也是政治权力的工具,它可以保证战争时期赢得战争的胜利;第二种把经济武器作为政策工具的方法,是使用经济手段在国外获取权力和影响力,包括资本出口以及占领与控制外国市场等等。

(二) 古典现实主义与冷战时期经济领域的国际法与国际组织

无疑,从理论的角度看,卡尔的上述观点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是不利的。如果国家都提倡自给自足的模式,那交换就成为不必要,从而让服务于国际经济管理以及国家间商品交换的国际经济法丧失存在的根本。而且,如果将经济政策视为实现政治权力的一种工具,本应以资源配置最大化为根本的国际经济法将迷失本性。而从实践看,尽管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触角少于伸到“低级政治”——即国际经济领域,但古典现实主义在二战后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强势,卡尔这种将经济视为政治的附庸,将经济手段视为政治与军事斗争的工具的看法,成为当时的一种流行的外交形式,从而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事实上,在古典现实主义影响下的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显然过分崇尚了武力与均势,国际安全是在两个超级大国核均势的恐怖氛围下得以维持。为了在军事上达成超越对方的优势,两个超级大国都把重心放在军备竞赛方面,甚至不惜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出兵阿富汗等。显然,这种不稳定的国际环境对国际经济合作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在这种氛围下,东西方之间的国际经济自由化立法的开展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就如卡尔强调,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结合起来,就会成为政治权力的有力工具一样,为了追求权力,将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兼而并用成为美苏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共同做

[86] [英]爱德华·卡尔著:《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105页。

[87] 同上,第106-107页。

[88] 同上,第109-110页。

[89] 同上,第111页。

法,甚至自给自足模式也成了两个集团之间所奉行的割裂世界市场的理论与实践的立足点。更具体的说,美苏权力之争引发的有关割裂世界市场统一的“遏制政策”与“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理论,造成世界市场上的东西方对抗。结果是,作为意识形态之争的附属品以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对抗产物,世界市场上出现了一个在美国主导下,以 W R M F 和 GATT 为支柱并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与此相对应,也形成了一个以前苏联为首由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的、以经济互助会为支柱的社会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例如,就如于 1949 年建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其宣扬的是“不追求商业利益”的口号。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个区域性经济组织,不如说更像一个为意识形态而斗争的政治组织。^[90]而美国为首的由 W R M F 以及 GATT 所支持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基本上是排斥社会主义国家参加,或者社会主义国家拒绝参加的。实际上,两种国际经济秩序存在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本集团内部的自给自足,以此为未来可能的战争做好充分的物质准备,同时避免发生不同集团国家之间的交流而让对方获取更好的“相对获益”。从效果看,这不仅是对世界市场的人为割裂,而且从根本上制约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性的经济法律关系的自由化运动也难以提上日程。

当然,冷战时期东西方经济交往还是在继续。但是,不难看出,政治因素是影响东西方经济关系的最大要素。实际上,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冷战时期东西方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甚至可以说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或者用更简单化和绝对化的话来说,“东西方贸易就是政治交易”。^[91]无疑,政治和安全关系始终是东西方关系中压倒一切的方面,东西方经济关系必须而且只能服从这种需要。换句话说,“经济关系是冷战的晴雨表。当东西方政治关系紧张的时候,东西方经济往来便十分有限,而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则带来东西方经济关系的极大发展。这是冷战时期东西方经济关系的基本特点。东西方经济关系的政治障碍彻底不存在之日,也便是冷战结束之时。上述特点使得冷战时期东西方政治关系与其经济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极其不平衡的,表现为政治关系基本上左右着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影响相对较弱。或者说,冷战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是很不一样的,前者是不平衡的互动”^[92]。

同时,古典现实主义者以军事优势与国家安全为对外政策的根本目的的看法,也影响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南北方国家关系的处理。具体的讲,是使它们对外经济政策的目标夹杂对军事或政治因素的考虑,甚至经常为了后者利益而牺牲国际经济合作的利益预期,也对国际经济合作关系的“法制化”需求关注不足。实际上,很多时候与其说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推行的经济政策是出于经济发展的目的,还不如说是为了适应东西方军事与政治斗争的需要。对此,就如摩根索指出,无论在什么时候讨论国际关系领域里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领土政策或军事政策时,都有必要分清是出于经济、财政等自身要求所奉行的政策,还是作为政治工具所实施的政策。例如,瑞士对美国的出口政策属于前一类,前苏联对东欧国家的经济政策则属于后一类,而美国在拉美、亚洲和欧洲所推行的经济政策,许多也应归入后一类。^[93]无疑,这不仅使发达国家在推动国际经济法律自由化议题上的内在动力不足,也使它们产生为避免将发展中国家推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从而对南方国家欲求“权威导向分配模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某些要求作出让步的可能,从而导致不利于国际经济法律自由化发展的后果。

总之,冷战后的两大集团之间长久的政治与军事领域的权力斗争,严重的影响了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全球性的以“自由化”为议题的国际经济立法始终不能进入普遍化以及繁荣状态,这种状况直到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才宣告结束。

[90] 在 1949 年 1 月 25 日,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前苏联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公报》指出:“……会议并且指明由于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认为不屈服于马歇尔计划的操纵,因为这一计划破坏国家主权和它们国民经济的利益,美利坚合众国、英国和某些其他西欧国家的政府事实上已断绝与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间的贸易关系。……”参见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941-942 页。

[91] 参见张小明著:《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6-177 页。

[92] 同上,第 177 页。

[93] 参见[美]汉斯·J·摩根索著,肯尼思·W·汤普森修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郝望、李保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1-42 页。

五、结束语

理想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的论战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第一次认真的论战,持续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影响深远。当然,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理想主义在外交实践上的失败使得其理论优势不能不最终让位于古典现实主义。客观的讲,古典现实主义在外交实践中总体上强于理想主义。^[94]

然而,古典现实主义并非万能,在外交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有许多弊端。例如,古典现实主义者强调维护世界和平要以均势为依托,但是,国际关系发展史上的许多事实却已证明这并不可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张伯伦政府对德国法西斯的一再退让和迁就,其本意就是在于平衡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力量,结果却差强人意,并没有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冷战时期,虽然美国和前苏联之间形成势均力敌的两大阵营,但事实是在美苏操纵下的世界局部战争并没有减少。^[95]而且,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即使在美国这个世界性的超级大国和国际关系理论最发达的国家,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也没有对普通的百姓产生很大的思想影响。如果美国领导人试图用古典现实主义去说服和带领美国人民在国际舞台上显示权力、实力和武力,其目的经常难以实现。例如,西奥多·罗斯福的现实主义观点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依凭此种观点试图将美国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是不可能的,相反,充满宗教色彩的威尔逊思想却很顺利地让美国卷入战争。在二战后美国所卷入的各种国际冲突中,领导者无不是以理想主义的激情词语与冠冕堂皇的口号赢得国会与国民对战争的同意与支持。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猪湾行动,或者是越南战争,如果不是以反对共产主义等所谓“邪恶势力扩张”作为幌子,以“民主”、“自由”等具有极强的煽动性的理想主义字眼作为口号,很难说美国人们会做出让士兵到离美国之外的地方去打仗的决定。^[96]之所以会出现上面所说的现象,除了和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传统紧密相关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理想主义者所描绘的世界和平蓝图以及“正义”、“道德”、“民主”等口号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感召力。至此,我们似乎揭开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即如果没有理想主义所感召的价值去维护,似乎现实主义的行动毫无意义;如果没有特殊的国家利益的攫取,理想主义的行动也不可能成功。^[97]可见,在冷战时期大国的外交政策,更多的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因素夹杂在一起,哪一种作用更大,实际上是一个难以量化的问题。

进而,理想主义意识在人们心中的根深蒂固,决定着理想主义者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重视精神将经久不息,也意味着古典现实主义者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漠视态度本身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实际上,虽然现实中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与理想主义者的期待存在很大的差距,但也不是古典现实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软弱无力、彻底无用。实际上,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在大多数时候,缺乏像国内法般的强制力的国际法是得到国家遵守的。即使是出于私利目的某些国家违反了国际法,它们往往也要以国际法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即强调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这无疑说明国际法在国家之中所形成的独有地位以及它们潜意识的“遵法意识”。无疑,《凡尔赛和约》体系的构建与国际联盟的建立及运作的尝试本身,就说明理想主义理论的某种合理性,至少是合乎了国际社会渴望永久和平的心声,也说明国际社会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作用的期待。虽然最后《凡尔赛和约》体系与国际联盟的失败成为理想主义挫折的最有力的证明,但二战后联合国与联合国法律体系的重建与运作——即使重建与运作中古典现实主义发挥出重要作用——又证明理想主义精神的生息不灭,也证明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与顽强的生命力。晚近,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法律全球化”不仅仅是学界的某种口号,更是一种标示法律发展潮流并已得到迅猛发展的趋

[94] 参见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 87 页。

[95] 同上。

[96] 同上。

[97] Vincent Ferraro, *Ideal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Talk to the Antioch New England Graduate School*, Keene, New Hampshire, 3 March 2003.

势。同时,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及促进国际社会合作与发展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而在国际经济领域,诸如 WTO、MF 等国际经济组织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方面所发挥出的作用已是有目共睹。可以这样说,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现实世界里,已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躲避这些国际组织以及相关的国际法而孤立的发展;也没有那个国家可以忽视这些国际组织与相关国际法的管辖效力。即使是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也是如此。

退一步讲,即使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发展事实不能完全支持理想主义的观点,但也是依凭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所无法全面解释的现象。如古典现实主义对国际合作的态度是消极的,他们从假设人性本恶入手,认为人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追求权力,人与人之间惟有争权夺利,无信任可言;推及到国家之间关系亦如此,国家之间关系总是斗争与冲突的关系,国家之间的合作成功率是微小的,世界和平的前景是黯淡的。但实际上并非都是如此,不仅是人类有善良的一面,国家之间也有合作的一面。例如,冷战时期联合国主持下在外层空间、海洋等领域的国际立法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同时,即使在二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世界局势处于美苏核均衡的恐怖状态下,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夺取势力范围以及军事优势的斗争,但在这种氛围下,它们之间也并非没有合作可言。实际上,这段时期国际核军控和核裁军问题上的国际立法取得不俗的成就,包括在核不扩散、核禁止以及美苏的双边裁军方面。此外,除对核武器的明文限制外,双方在以核威慑和恐怖均势为特征的两极格局中形成的一系列心照不宣的安全机制颇具典型意义,美苏两国脱离军事接触的安全机制便是一例。^[98]

而且,在冷战时代,国际法虽然时常被“扭曲”,但从总体上讲仍然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这些作用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99]第一,国际社会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实现“共存”,即使在冷战的最紧张时期,国际法也使得在两大对抗集团之间作出可行的安排成为可能,如维持必要的交往和在各自首都保留外交和领事机构等。第二,国际法提供了一个国家之间在核军控与核裁军方面进行合作的法律框架。在这个框架内,《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 年)、《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1974 年)、《和平核爆炸条约》(1976 年)等重要条约,经过谈判,最终签订,并被作出解释和实施。而且,这些条约或协定的达成与实施,本身又推动了该领域的国际法的发展。第三,国际法对两大集团间在联合国内外的冲突关系作出了外在限制,甚至被许多人视为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代理人之间进行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是在战争法的限制下进行的;而这种战争法是由惯例和条约来解释的。第四,甚至对于北约和华约这两大对抗集团之间的关系,国际法也指出了处理集团内及集团间关系的规则和程序,虽然并不是任何时候都遵守了这些国际法。实际上,1975 年的《赫尔辛基条约》是北约与华约这两大对抗集团共同努力的结果;并且考虑到条约的签订和实施过程,它还被看作是条约法的典型。此外,当发生对条约内容解释的歧义时,国际法则给解决这些歧义提供了一整套的指导方针。虽然前苏联曾经宣称,前苏联集团内部的关系,由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主义”,后又被称为“无产者的国际主义”这种更高的原则所指导。但是,前苏联从未声称自己有超越国际法限制的任何权利。甚至连勃列日涅夫主义也是以《华沙条约》的精神表达出来的。因为根据国际法,任何超越国际法的权利都难以维系。现代国际法,在经过几个世纪发展后,实际上已经获得各国的普遍支持,联合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普遍性国际组织是国际法的重要执行机构之一。

此外,虽然冷战时期大国频繁使用否决权,使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一致”原则遭致严重破坏,尤其是在东西方冲突色彩较浓的地区冲突中,包括柏林封锁和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安哥拉内战、阿富汗战争等等事件,关于制止侵略和军事冲突的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基本上处于无用武之地。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一些不涉及东西方斗争或者东西方斗争色彩不是很浓厚的地区冲突中,联合国还是通过联合国秘书长的调停与斡旋以及组织维持和平行动等形式,为冲突的解决作出自己的贡献:^[100]一方面,作为联合国行政首脑的联合国秘书长,享有比较广泛的职权,包括在争端解决中享有进行斡旋与调解的权力。

[98] 参见王杰主编:《国际机制论》,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9—270 页。

[99] 参见[美]熊玠著:《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余逊达、张铁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9—30 页。

[100] 参见张小明著:《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4—205 页。

在冷战期间,为地区冲突的和平解决,联合国秘书长经常在争端双方之间进行斡旋、调停和仲裁等工作,这种工作对于许多地区冲突的解决发挥出了一定的效果。例如,在1961年底,联合国前秘书长吴丹就荷兰同印度尼西亚关于新几内亚地位的军事冲突进行斡旋,促使双方代表后来在联合国总部开始谈判,达成了解决问题的协议。再如,1989年底,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对寻求解决萨尔瓦多冲突的办法进行了外交努力,后来萨尔瓦多政府同反政府组织在德奎利亚尔主持下进行了谈判,最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武装冲突;另一方面,从194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约40年的时间里,联合国大致先后进行了13次受联合国秘书长直接领导,主要以军事观察团和维持和平部队形式的维和行动。联合国进行干预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属于涉及东西方直接对抗的地区,这是维和行动得以成为现实的关键之处。从效果看,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为有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例如,在中东阿以冲突、苏伊士运河危机、黎巴嫩动乱、刚果事件、塞浦路斯冲突、印巴战争等等地区冲突发生后,联合国所进行的维和行动均取得一定的成效。

至此,我们认为,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论战中,理想主义的失败和古典现实主义的胜利并不能说明它们某一方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否则,今天就不会出现受理想主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也不会有种种新的理论流派接二连三的对古典现实主义进行批判。实际上,理想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的研究范式之一——跨国主义范式的最初尝试,为扎根这一范式的其他理论学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验与启示,在跨国主义范式中的其他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普遍主义等等,都与理想主义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01]从本质上讲,扎根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理想主义的精神,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影响深远。对此,就如西方学者的评价,无论如何,威尔逊主义在思想上的胜利比任何其他政治成就都更根深蒂固,因为每当美国面临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使命之际,它总是殊途同归的回到威尔逊的观念上。^[102]而在当代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实践中,理想主义精神仍然生息不灭,就如国内学者指出:“尽管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理想主义学派受到重创,影响开始减弱,尽管在卡尔和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攻势下,理想主义理论显得黯然失色,但是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并没有完全退却,‘它仍然存在’,它仍然在裁军、战争法、维持和平、全球生态和联合国等问题上坚守着阵地。”^[103]

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古典现实主义的强势地位已走向终结。随着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地位相对衰弱,尤其是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与中东“石油危机”之后,各国对相互依赖与国际合作开始有了重新认识。面对这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古典现实主义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传统主义对其的修修补补也满足不了前者所需要的理论突破,同时过于抽象的科学行为主义也解决不了此时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这时,对古典现实主义进行理论上的修正与补救,乃至较大的突破,并融合古典现实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互补优势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开始崭露头角。^[104]同时,在针对古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展开批判与论战中所产生的另一研究范式,即新自由主义也进而出现,并很快发展成熟。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两个学派逐渐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位置,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或具备不同的解释功能。

当然,客观地讲,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对冷战时期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的影响是深刻与深远的,也对同一时期以及以后很长阶段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发展现象具有良好的解释功能。在现代国际法史的研究中,离开对它的探讨,即使不能说绝对不行,但至少是不全面的。

[101] 有关国际关系学中的跨国主义研究范式的详细介绍。参见李少军著:《国际政治学概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8-59页。

[102] 参见[美]亨利·基辛格著:《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103] 参见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104] 同上,第120页。